

在后现代主义中建构犯罪学理论^{*}

[英] 韦恩·莫里森 著 刘仁文^{**} 译

内容摘要 现代犯罪学留给我们至少 11 种互不融合的理论结构,但它们的要塞基础随着现代社会理论的消亡而土崩瓦解。在后现代社会里,能否建构起一种一般性的犯罪学理论或融合不同的犯罪学理论?怀疑不是绝望的理由,而是意识到需要采取创造性行动的证据。

关键词 犯罪学 后现代 建构

“大多数天生劣等的生物都屈从于他们社会环境的困境和诱惑,并由此产生反社会的行为……要将环境改进和修正到使这些低下堕落的人能通过诚实的社会竞争来获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胡顿,《犯罪与人》,1939: 388)

“福利国家的解体实质上是“将道德责任放归原位”的过程,即将道德责任放到个人的私人利益中。这便引出了道德责任的一段艰难时期,因为这不但直接影响着那些需要一个富有责任感的社会的穷人和不幸的人,而且(也许从长期来看首先是)持久地影响着(潜在的)道德自我。这一过程将作为一切道德砥柱的“为他人而存在”视为账目和计算、金钱价值、收入支出、可否消费得起的奢侈品等的标准。这是一个自我激励、自我加速的过程:这一新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不停地蚀化集体服务(如公共卫生、公共教育、公共房屋、公共交通等服务的质量),促使有能力者通过自我购买使自己从集体规定中解脱出来——这一行为就意味着其通过购买使自己脱离出集体责任。”(鲍曼,《后现代伦理学》,1993: 244)

本书叙述了犯罪学从现代性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发展轨迹,但这个故事并不简单,无疑还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版本。然而,我们当代社会语境的复杂性和歧义性却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这种歧义性?对某些社会观察家而言,后现代主义意味着一种信任危机,它有破坏现代性的飞快发展的危险。我们生活在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所梦想的未来之中,却感到不再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统一抱任何希望。某些评论家甚至把威胁社会的新的紧张状态的责任推到了社会规范工程(normative social project)的理念上。默里(1988)及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的社会秩序问题是个体的问题,是个体未能承担道德责任并且未能融入不依赖武力或欺诈的社会互动之中。默里强调,我们不能否认,即使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最穷苦的人,他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了维多利亚时期与他一样地位的人的梦想。因此,如果问题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期或后现代社会问题则不需要让国家来承担责任。我们则必须从国家手中夺回这一道德任务。目前“我们”不必为一个健康、自然的社会统一所要求的社会相互影响及网络的多样性而忧虑。家庭生活的衰落就是一个征兆。对右派作者而言,现代性在社会构建工程的名义下,剥夺了自我的道德责任感:“人们作为个人和社会能够独立实施的功能应该由个人和社会来实施。”(1988: 272)

但是后现代性中的社会差距指什么?混淆社会道德的一连串的调解又是什么?是什么使个人更容易做出无人性的行为、使国家忘记社会相互依靠的现实?下层社会和全球化日益增长的问题(包括有组织犯罪和多国合作的全球化)不但要求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群体独自在生活中有所成就,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公共规范工程遭到破坏,应该由谁来负责解释、承担这一社会疾苦的增长呢?

阐明个人关怀,一直是小说家和诗人的事情,而小说家或诗人除了写作,没有其他的公共责任。伟大

* 本文系作者《理论犯罪学——从现代到后现代》一书的最后一章(第 18 章)。

** 刘仁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博士后

的作品造就社会统一：它会赋予读者一定的洞察力，并把各种人类状况交织在一起。但是个人关怀和公众关怀之间的区分还是成问题的。一种约束性话语，就会承担公众责任，比如犯罪学——它有责任本着弄清各种问题、困惑或结果的态度来阐述人类状况的前景和真理。哈罗德·佩平斯基和里查德·昆尼（1991: ix）要求建立一种新型的“调解犯罪学”，通过“减轻痛苦达到减少犯罪的目的”。部分地看来，痛苦是行为的无意之过，是（不）作为的结果。在下层社会的状况中，在社会中，个人权力不均导致的性或个人侵害中，在封锁产品消息或生产劣质产品的大型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平衡中，那些成本低廉却要价很高、并且不能投资医学研究以提高药效的药品公司中，这一点十分清楚。当一小部分人聚敛大量财富，而一大部分人却相对贫穷时，就产生了一种哲学和经济上的痛苦。痛苦是犯罪本质的一部分——犯罪学的理性逻辑（logos）未能足以传达的侵害。犯罪学支持了立法和组织的权力：然而现代性中的社会秩序对这一立法和组织的权力作出反应——使人脱离了他在习惯中的地位 and 身份，归入按照功能上的具体特性可以认识并联系的人性物体的范畴——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可能就是“社会秩序是有问题的。为公共福利立法、或规划社会空间、或从事确定正常人和越轨者、精神正常者和精神错乱者、罪犯和公民的身份的实证主义犯罪学事业，这一切伟大的事业都遭到了削弱。社会空间不能准确地确定和规划——社会秩序确定不会如此容易——在建立现代性的人类结构工程中，已经出现了矛盾和混乱。犯罪学因此便没有权利存在吗？所有的行为都仅仅是海市蜃楼——一些没有系统工程可做的专业人士的狂乱？至少有一位当代犯罪学家，科林·萨姆纳（1994）认为主流社会学说法已经消亡。他的《越轨社会学》一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讣告。然而，消亡的也许只是围绕结构进展和民族国家的形式，把社会问题看作社会内部问题、把权力看作国家的工具等一些理论形式。越来越多地，两种分析——全球界限分析和宏观社会学进程分析，代替了提供框架的民族国家，从微不足道成为真正全球相互作用的分析——例如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成为解决人类状况问题所必需的。具体社会理论必须和一般理论进行对话。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本文中所提到的对抗力，下面对莱奥塔德的分析可以作为最后的提示。

莱奥塔德和现代社会理论的消亡

法国作者让·弗朗斯瓦·莱奥塔德写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后现代状态》（1984）。表面上，这本书是关于知识领域计算机技术影响的一个报告，实际上它是对现代科学的评论，提出了许多后现代主义下我们对科学的行为和期望。尤其是，莱奥塔德十分关心叙述形式的知识合法化问题——或者日常科学语言游戏——以及它如何影响社会联系。他的评论可分为三个阶段：

现代性通过对某些神圣叙述的信任得以巩固——尤其是关于进步、自我提高和解放的叙述——与社会理论原型的叙述相联系——比如马克思、迪尔凯姆及韦伯——涉及真理和科学（如实证主义）为社会的建构提供基础并识别前进中的社会发展方向（比如人性的辩证提高）的能力。这些叙述不能继续作为后现代状态中的支撑点，我们对元叙述已经产生了怀疑。

现代性受到两种形成社会整体的方法论支配：

- (a) 结构功能主义，或社会形成了一个有机作用的整体，它的每一实体都能放在整幅图画中（犯罪学理论的传统图画）。或者
- (b) 马克思的文化遗产中的批评理论，建立在阶级斗争和通过反抗得以前进的原则之上。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理论，与第一个模式一样也是功能主义的，并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作为一种结果：

虽然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我们还是面临着关于科学知识地位的合法化的危机，这一危机对现代社会形成了包围——它对后现代状态进行了定义。在合法化受到怀疑的同时，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甚至真理也成为可以出售的物品——知识也成为一种商品，工业革命已经证明，没有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现代财富，而财富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这种财富——技术——财富——技术的循环路线最终导致科学成为一种商品。一种新的技术工具需要投资，更有效的技术工具能够造出更多

的利润,同时又需要更多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销售额的一部分在用于深入提高的研究基金中循环利用。正是这一环中,科学成为生产力即资本循环中的一环。”(1984: 45),科学不能被看作是真正为了追求真理的事业。它已经成为一种按照制造财富的能力来判定的生产活动。这一行为标准代替了启蒙运动寻求真理的动力。

学院的研究日益成为“钞票”的问题,或者零碎的研究合同的问题。大型公司及政府部门纷纷资助研究,因此它们引导着信息与知识的生产。而在相当具体的要求下,实用主义考虑占据了主要地位,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看作规范的建构工程,它变成了市场语境中相互作用的许多地方性语言游戏。要想描绘全部图画,而又不落入某种令人怀疑的传统,那是不可能的。莱奥塔德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付出了足够高的代价来怀旧”(同上: 82),就不用担心。相反,我们应该和叙述作战,解构并阐明那些无法表达的东西,使受压制的声音浮上表面。我们应该高兴地拥抱现代性的让位,把生活看作一个很大的派对,享受它的多样性,惊讶它的复杂性,并且惊异我们的智慧。除了一点——犯罪学家们对此太了解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邀请参加派对。

莱奥塔德要求我们受纯正的新现代性修辞的吸引。语言游戏的可施行性是它们包容性或不包容性的唯一标准——这是知识界精英的形象——当然,划分标准成为一门技术,变得可以施行。出现了知识的新形式——权力关系。反射性甚至欺骗了莱奥塔德:当他提到元叙述的衰退时,他自己的文本本身就是元叙述的兴起和衰退的元叙述。

后现代主义是否暗示着建构一般性理论或融合不同理论是不可能的?

规范的现代性乌托邦要求人们互相合作,努力建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结构。现代性从对人类存在所隐含的空虚的反射性(不)理解中(重新)建构了社会秩序:构建意味着克服任意性,确保可预期性。工具是知识和权力。一个强大的社会需要控制那些背叛它的人:刑罚的正当性就在于,它不是对形而上学错误观念或任意政治判决的辩护,而是对社会知识的一部分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维护。完全适应环境的公民——社会化的个人——是指那些理解社会存在的意义,理解社会游戏规则的必要并按规则行事的人。对个人提高的希望也增加了规则所预期的行为的可行性与技巧——个人改善他或她自己的希望丰富了这个社会。社会理论通过要求揭示结构来控制任意性、可能性,而不是从事破坏或建构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这种意识形态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按昂格尔(1976)的说法,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理论既是形而上学的,又是政治的。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问题上,它的观点是,没有一种“科学”的解释是可能的。我们无法再否认,社会理论的发展和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是分不开的。

“理论的进步依赖于政治事件。理论所包含的教义既是理想又是描述:理论做出的选择是在社会是什么的观点中及社会应该是什么的概念中选择。这些选择既不是任意的,也不能作为逻辑或经验的证据。它们建立在对社会秩序的要求和对人类本质的需要的推测概念基础上。这些概念是由历史知识得来的,却不能必然地与其保持一致。”(罗伯特·昂格尔,1976: 267)

古典犯罪学帮助建立了早期现代性,奠定了使立法动力和将犯罪作为与民族国家日益增长的中央集权相关联的社会管理的中心概念合法化的结构。犯罪学成为实证主义工程的一部分,创造能够使有组织的、官方的现代性合法化的知识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它形成了许多实证主义策略,从同感(consensual)功能论到批判功能论。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在传统犯罪学领域中,法律反映社会舆论的观点很大程度上牵制了批判理论的支持者(超过了自由资本主义城市情结的壁垒)。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密切联系导致了“福特”式的城市生活方式,这作为功能论者/实证主义者情结是很容易理解的。后现代主义的开始,也许被认为等同于语言的多功能性,从强调过程与责难概念的标签论的角度出发,也许可以被视为对越轨者的识别(过程)。当官僚主义运用批判理论作为它可以作为形而上的敌人来进行攻击的思想时,标签论已经证实了假定提供福利和安全的官僚政治的多元性和可能性。同时,全球性的社会结构变革使得经济和文化形象很难控制。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以后工业社会为标志,剥夺了社会最深处关系——要相信任

何过分简单化的舆论,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回应,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似乎有些根据。解决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元性成为一种向常识或管理主义的倒退,是否定理论化整体的需要,同时又在较容易并且更明显的存在或地理中寻求支持的倒退。

可以期望,在常识犯罪学中有许多常识:常识,通过目标强化或运用机会理论,使得犯罪发生在你身上的机率降低。这就是说通过使珍贵的土地高墙林立,通过聚焦下层社会的犯罪,通过以牺牲教育和儿童培育中心为代价给警察提供更多的资源;通过投资于更强大的监察和跟踪易识别罪犯的技术;通过修建更多的监狱、关闭吸毒者矫治门诊;也许,最重要的是,通过拒绝多样性——提倡和面貌相似、感觉仿佛的人居住、工作在一起——通过新部落主义控制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来实现社会空间私人化。理论上来看,在认识论多样性面前,现实主义成为游戏的标题。在为有效契约工作或关注对抗理性的犯罪:如街头犯罪或明显犯罪人中,当代犯罪学很大程度上是个现实主义者。冲突理论或左派理想主义(人们正这样称呼它)被归为理想主义乌托邦王国中,也许是有理由的。而在美国以迈克·戴维斯和艾略特·柯里等作者为代表,在英国以杰克·扬及其他人为代表的左派理想主义,在对工人阶级利益的真实的关注中建立起了其理论基础。在大多数著作中,伟大的理论成为幻想。“如果有人要搞犯罪学研究,一定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这种评论非常时尚。但是,对我们当今时代中一个有代表性的短期发展(威尔逊和赫恩斯坦,1985),或者“我们对自由的许诺、我们的共同富裕、我们的育儿方法,以及我们的流行价值观”(威尔逊,1985:251),或者自制(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1990)等问题稍作模糊评论之后,作者们无一不重新回到控制个人犯罪的措施问题上来。而且,国家已经不再需要社会学或犯罪学来决定控制的方法;那些在里面的人受到诱惑,永远都是消费者的角色;那些在外面的人已经成为磨房里的谷物,我们早已熟知它们的特性,犯罪学还有什么可提供的呢?犯罪学可能还会在哪里起作用——在全球化趋势中,在揭示真正社会危害的过程中——谁来付款呢?国家已经不再对“真正”的一般理论感兴趣。

但是建立一般社会理论的努力不再具有凝聚力,仅仅是因为情况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吗?为什么知识和权力工程应该向市场投降,并且我们要接受地方性个人主义的声明呢?

首先考虑一下现代犯罪学留给我们的多元的理论观念。戴维·休谟关于社会理论的关键是理解人的本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对人类本质、社会秩序的不同解析,犯罪学理论也是各不相同的。下面列出了十一种犯罪学理论的结构:

犯罪学理论的十一种结构

| 理论 | 人类本质的观点 | 社会秩序的观点 | 正常发展的概念 | 越轨的原因 | 改造越轨者 |
|-------|-----------------|-----------------------|--------------------|-------------------------------------|---------------------------------|
| 差异交往论 | 人是必须向他人习得的社会个人。 | 多元性价值观和文化群体,一种占主导地位 | 在适当角色模型和社会习得基础上塑行为 | 和违法者、罪犯交往 | 和非罪犯交往 |
| 紧张理论 | 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社会个人 | 价值观相对一致:占主导的文化目标 | 追求社会认可的目标和制度方式 | 目标和可行方案相分离 | 增加每个人的机会 |
| 社会控制论 | 消极:人本质上是社会的、自私的 | 价值观和社会机构一致 | 联合机制的创立—通过“正常”方式诱导 | 和传统社会秩序结合较差或已断 | 增强对传统社会秩序的依时,增强一致性 |
| 标签论 | 人是对意义作出反应的社会动物 | 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主张多元性 | 贡献和论符号相互作用 | 消极标定经历 | 拒绝将越轨行为扩大改变刑事司法系统对越轨者的处理方式 |
| 自我发展论 | 人是受增长支配的 | 社会是精英管理的社会,个人投资可以实现增长 | 定义自我与社会规范、成功形象相关 | 与犯罪一致的自我形象—低自控的施行 | 挑战旧自我观念形成新的自我身份 |
| 心理分析论 | 里比多的 | 社会结构建立于对欲望的抑制,幻想成为潜意识 | 在社会范围内本能驱动的满意 | 早期冲突解决不当导致罪恶感或弱超我发展,超越法律的欲望,受到刑罚的欲望 | 对行为的无意识决定因素有更清楚的了解——取消多余刑法刑罚的欲望 |

| 理论 | 人类本质的观点 | 社会秩序的观点 | 正常发展的概念 | 越轨的原因 | 改造越轨者 |
|--------------|---------------------------|--------------------------------|------------------------------|-----------------------------------------|-----------------------------|
| 病态激化论 | 人本质上是社会个人,但越轨者有异常能力和训练 | 一致结构允许正常享乐 | 实现感官刺激的最佳水平 | 和消极家庭经历结合在一起的增长的刺激水平的驱动 | 寻找适合社会的位置的刺激成为趋势 |
| 理性选择论 | 享乐主义者 | 社会是一系列众所周知由法律制定规则的社会游戏 | 最大化享乐/痛苦和最小化享乐/痛苦 | 犯罪成本:收益比率超过不犯罪的成本收益比率 | 增加犯罪成本和侦察确定性或增加不犯罪的收益 |
| 存在主义理论 | 人是由语境和历史决定的开放性器皿 | 看似荒谬——失控——虚无主义的威胁 | 控制生活过程:权利意志 | 紧张和冲突拉力并存的世界,不能指导生命周期 | 对偶发事件的自我了解 and 意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
| 社会剥削,下层社会 | 条件作用的结果,时常变化。一旦社会化,很难改变 | 各种各样 | 在亚文化中被困,一种贫穷文化或结构劣势 | 受到正常参预途径的排斥,不满或社会化不理想 | 各种各样——从基本的职业机会创造项目到减少福利条件 |
| 马克思主义/左派理想主义 | 人本质上是合作的,但依赖于社会结构,是社会中的人。 | 由对抗和阶级冲突构成,法律保护系统利益并帮助主导的社会阶级。 | 发展合作与和谐的关系。在资本主义中侧重自我的商品化和交易 | 在资本主义下有隔离经历并且曲折成长,自我被迫进入主要关系,市场变化决定其价值。 | 激进的社会改革:消灭生活世界和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状态。 |

每种理论结构看起来都保持了纯度和逻辑上的一致,却都是以经验的揭示为代价。除了存在主义理论是一个例外,每种理论都遵循了现代性的指引:建立一个要塞,在这个要塞处形成坚固的基础,并建立一个凝聚的框架。它们是互不相容的,还是可以相互融合的?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1990)指出,融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理论都建立了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独立的一般性理论。

对于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而言,一个独立的一般性理论应该:

- 关注日常犯罪事实的。
- 忠于古典犯罪学的知识;并且
- 忠于实证主义工程。这些作者承认古典犯罪学是关于犯罪的控制理论,而实证主义力图解释犯罪性,这样就消除了古典犯罪学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分歧。

然而,这个一般性理论的范围缩小了,因为,对于这两位作者:

- 犯罪是日常生活中的常见事件。需要解释的存在(犯罪)正如犯罪统计学中所反映的。因此,复杂的法人犯罪、当权人士的犯罪、多数犯罪的全部特殊性完全被忽略了。
- 古典主义成为对犯罪的解释的解释。没有关于古典犯罪学反射性方面的讨论,即社会公正问题被忽略了。同时:
- 实证主义成了对犯罪人解释的研究,并通过不同的社会化实践造成的不同的自我控制的理念将问题予以解决。

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的理论,是关于犯罪的一个有限的理论,而不是一般理论。它不仅没有讨论社会秩序的本质以及法律合法化问题,也几乎没有感到自我和当代语境的历史偶然性。我们把犯罪性看作由有缺陷的社会化引起的同时,没有找到社会化作用的定义。日常生活被置于毫无疑问的层次,而不是把它放到宏观社会学进程中:相反,日常生活由成套的规则、来源、身份、活动、目标、地方、能力、(不)确定性、(误解)理解、工程、合法化和道德构成,而这一切都是一系列历史偶然性的结果。因此,犯罪性不是某种自然的身份,而是(有时是临时的,有时是发展中的)过程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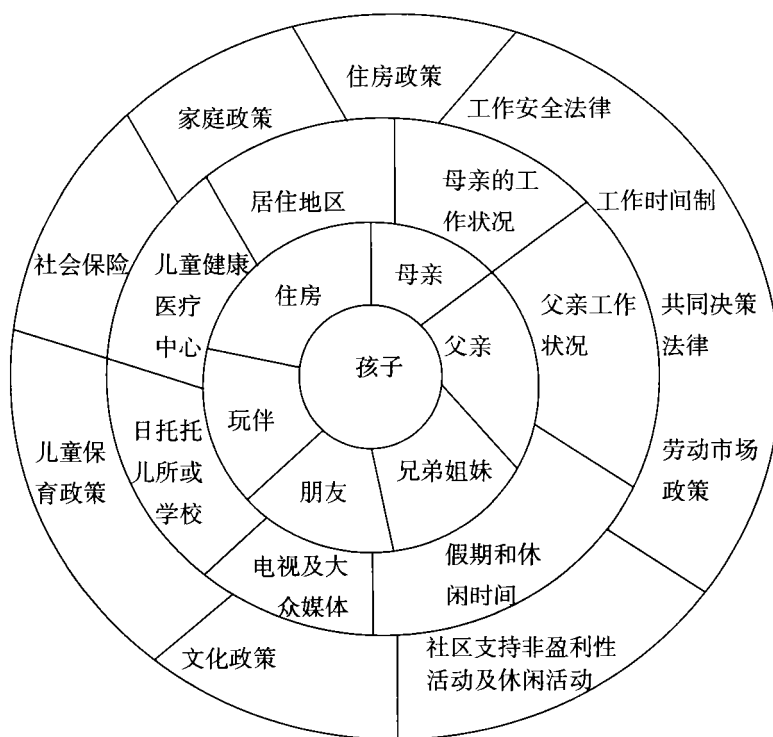
安全身份的建立是构建社会秩序过程的固有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中的晚期现代社会秩序的复杂性使得安全的、“毫无疑问的、自然的个人身份的观念成为一种落伍的事物。作为对后现代主义的回应,晚期现代西方国家拒绝了它空间上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它几乎不能做其他任何事,但在它的修辞中,否

认了空间是社会的,否认了自我总是在社会中得以构建并行动。相反,我们目睹了社会空间的私有化。这种私有化可以使个人以更有效的方式利用资源,或者提供自动合作的机会,但这似乎要以社会紧张状态和要求承认相互依赖的社会统一为代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指导这一工程的,只有一种真正的社会学想象。没有它,我们怎样才会相信,民族国家内部社会网络的私有化将意味着国家以外的团体的增长,以及自我意识、反射性及个人对自我工程和生活周期的控制的增长?相反,在当代英国和美国,我们目睹了一种修辞,它大声反对国际协议,否认任何对调解构成个性的社会进程范围的基本需要和职责。右派人士认为,只有通过让下层社会听任自便,才有可能(重新)塑造个人的责任感。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用实证主义方法证明了确定罪犯的不可能性,同时使犯罪性这一概念私有化——解决犯罪的办法在于自我控制,而这种自我控制是未经语境化的家庭机构社会化进程的结果。我们还能找到比这一论点更伟大的私有化例证吗?

如果后现代主义来自于现代性,那么我们是谁? 身在何处?如何弄清犯罪学的“现实”?

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历史和现代性构建过程中偶然性的结果。我们是社会力量中多种因素决定的产物。现代性中,理想的个人身份就是现代的自我,独立于性别、阶级、种族之外,并以建立自我为个人工程。社会工程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多种角色和愿望、理想和欲望的有区别的社会秩序。但在这种社会秩序中,人们已经被定位,并按照他们的欲望、喜好、报负、需要来相互影响……没有剥削、压迫、受害,没有使他人犯罪的必要……然而性别、阶级和种族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性别、种族和阶级——社会地理学有助于形成(非)现代身份。偶然性意味着任何犯罪学理论结构的图解——适合后现代主义的——都不以坚实的基础为前提,而立宪主义易变的形式必须都要设想。马顿斯(1993,他自己在K·桑德奎斯特早期的一篇论文基础上于博特姆斯再度提出,1994)为我们打响了头炮。



如果我们要忠于实证主义工程,就需要理解犯罪人以及他或她的性格的造成。这一图解的优势在于我们能看到地方政策和更宽层面的政策的相互作用。每一个圆本身就是移动的。其中的组成部分互相影

响对方。例如住房的特点、以及居住地区,给父母提供了机会和压力。家庭人物和社会结构互相作用:意识形态、文化信息、自我概念,都贯穿于这些结构中,政治和文化环境也以多种方式互相影响。丹尼佛(1984: 100)认为大多数传统的自我和社会化理论的失败,就在于它们“个体发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低调陈述了“自我社会关系的深度相互作用的本质”以及社会环境的多变性。

这一图解在时间上不是静止的,它必须考虑到现代性本身。现代个人的构成需要一种历史的、具体的社会生态学和社会控制。

社会安排怎样才能在后现代主义中体现公正? 在偶然性文化下社会秩序怎样合法化?

传统地来看,当社会安排反映某种自然秩序时,它就获得了合法性。韦伯的类型学区分了基于传统和风俗(印度种姓类型)之上的合法性的静态本质,以及基于理性讨论、协议、形式化程序(法律理性)之上的合法性的静态本质。社会学,通过强调其已经脱离了前现代封建主义制度残余的影响、成为了一个结构——功能整体的反映,在帮助现代社会安排实现合法化方面,已经起到了重要作用。强调精英管理的社会理论,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一致的、原则性强的法学体系,通过支持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运作的功能制度的形象,都有助于合法化。但是,后现代性却对此提出质疑。后现代的合法性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的:

自我控制和约束

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社会化。社会化是指无须借助明显的国家暴力,可预期性的机制与行为重复的行为的融合。现代行为被认为是理性行为,这是社会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行为者可以运用追求可理解性目标或适应行为模式(规则)所界定的理由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与以信仰格式固定的社会化为代表的机械统一的社会控制不同,有机统一的社会控制是自我及社会化语境的辩证统一或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自我和社会控制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过程得到了强化。在它表示晚期现代性中自主自我的社会产生的同时,它也产生在后现代主义有疑问的状态之中。

霸权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之一,暗指当今民主社会的控制权是由精英霸占意义的创造才得以施行的。后现代主义对许多合法性策略的非理性描述的重要影响受到限制,是因为媒体和分裂话语可能的破坏性作用被结构(不)传播变得失去了作用,信息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分裂社会的霸权意识形态。霸权思想在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常用,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下列过程:

重要媒体的集中,如报纸、电视的合并

对不满意媒体的信息进行排斥,并认定是无意义的。

对有预先构想的,标准动机做出重要行动(如消费)的公众的标准化。

不重要信息的多样性,如风格、时尚、个人丑闻。

霸权在后现代主义中更为复杂。它自身几乎是一个海市蜃楼。在后现代主义中,它作为日益增多的知识和观点的多样性的结果而存在。同时,这种多样性又意味着很难对保证舆论的政策给出一个首要的实质理由,同样,也很难维持一种可以停止政策的评论。

后现代的政治和社会决策始终是专家统治

后现代的民主依赖于冷漠。在偶然性文化和信息过多的条件下,完整的讨论社会问题,很难达成一致

意见。因此,我们维持表面讨论的同时,牵连到的事物和政治影响都必须局限于合理的和理性的。“他者”都被疏远,并且无法理解参与的价值。社会空间的私有化看起来更像是它把权力归还给地方,看起来好像它以官僚主义为代价赋予个人权力——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要求这样——却成为对空间的非社会化,时刻威胁着要发动各种规模虽小、却无处不在的压迫。

在后现代主义下,实质的合法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合法性表现在程序上。

在现代性中,知识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社会看清自己——使反射性成为可能。这是开放社会或透明社会的理想。在这种社会中,知识反映现实。相反,后现代知识的概念认为知识、科学真理是程序的东西——我们所维护的真理是在寻求它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做出的最大努力的结果,但是它总是局限于我们的努力和程序,所以真理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因此专家们做出的决定是人为的,和某些人以外的科学保证没有任何联系。专家们做出的决定总是认为某些因素相关,其他因素无关。如果相关性的标准发生变化,决定的结果也会发生变化——决定的合法性,成本收益分配的公平性都成为相关性这一标准的结果。最终这是一个划分界限的问题。换言之,这是非常政治性的问题。这是讲我们认为这些因素相关这些因素不相关的问题——但理性法律的合法性并不是这样表现的:它表现得似乎它必须是这样,似乎这一结果是非常自然的。那么后现代主义中的现行法律以什么为基础呢?古典犯罪学认为它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某些叙述的基础上,实用主义作为它揭示本质的伦理学,那么后现代主义的法律建立在什么之上呢?答案是:它不需要任何基础;因为它可以在程序正确性中实现自己的合法性。准确地说,这是韦伯的观点:现代法律理性的权威不需要实体的合法化,只需要形式的合法化。因此,我们可以使任何行为或失职成为犯罪——即使是在没有关于这种合法化的合法社会目的的地方,犯罪仍然存在。这种自然主义范例的客观主义是一个幻想——是模糊现实的一种修辞。正是由于不能获得某些自然客观主义,才使法律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律不需要基础——法律是能够自动生成的——因此法律提供了强大的后现代主义基础,它是纯粹的实用主义。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纯粹理性的危机呢?我们从事于实用理性,即我们行动,我们立法。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做。后现代主义引起的危机可以由立法(包括非立法即非刑事化)和警备来应对。

合法性的非合法化要求有一个心理学框架。伊斯顿(1965)对政治权威采用了系统方法,认为政治系统将会看起来是合法的,如果满足(a)它反映民族的种族和文化身份,并且(b)它满足人民大众的要求和利益。这两个因素在后现代主义中可能很难实现,导致国家不再相信它从现代性中吸收的管理许多“进步性”任务的能力,人民大众不再相信理性的政治结构。只要它提供的社会产品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和利益,人们就会服从这一“理性”政治体系。

社会公正、位置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情绪

位置性——社会地理学——是公正和社会理论话语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公正的实际现实一直都是胜利者的公正。犯罪学忽略了那些胜利者没有给之贴上标签的许多犯罪行为。后来的马克思和尼采二人都指出,许多我们所谓的社会公正的哲学或者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其实是把“公正的”、“自然的”、“功能性的”等标签归于那些陷害、忽略、排斥及约束他人的权力现象的行为。正如左派现实主义指出的,我们把犯罪行为这一现象归因为犯罪人自己时,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自我是处于社会网络中的。相反,右派现实主义运用了“反应态度”的观点。反应态度是我们看到其他人或群体时所产生的情绪状态。我们认为他们和我们有共同的道德结构,并且有能力做各种行为。他们犯罪时,我们非常气愤,因为我们一直把他们看作与我们一样的道德动物。如果是偶然造成的伤害,我们的气愤会减小,因为我们意识到任何道德上的谴责都是不可归属的——右派现实主义指出,实证主义似乎和这些道德反应相悖,因为有时候它认为犯罪人不需要对他或她的行为负责(关于这些道德反应有多么深入人心,参见斯特劳森的康德式的观点,1974)。

右派现实主义始终坚持认为,对犯罪感到气愤是正确的。按照他们的分析,犯罪不仅仅是社会问题,还是要求表达气愤、要求正当地报复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就相当于否认了我们身处道德社区之内。

但是这种气愤不是在后现代主义中形成的唯一情绪。如登辛(1984: 224—8)所定义的,不满情绪是自我憎恨的一种自我毒害形式,产生于对某些情绪的系统抑制,包括嫉妒、骄傲、气愤以及报仇和自我征服的欲望。登辛认为,不满是后现代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一种情绪。它把上述各种情绪状态塑造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观。这种建立在报复、仇恨、恶意和对别人的幸灾乐祸之上的情感,反映了一种隐含的自我憎恨和自我价值的缺失。它形成了一种情绪基调。包括社会民主在内的社会结构系统地创造了这种情绪,而这种社会民主又支持人人享有平等权利,同时又允许在期望和现实世界之间存在差距。这些社会结构“引起了青年、老人、妇女、残疾人、那些受到性或道德污辱的人、以及种族和少数民族的成员等人的不满。”(登辛,1984: 226)当经历自我或群体伤害成为命运,并且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时,不满情绪是最强烈的。不满情绪伴随着无助和无望的增长而增长。在这一时刻,别人就变成了应当报复并施以暴力的对象。

登辛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使这种不满情绪继续增长。强调性爱审美、财富、男子气概、成就、幸福、成功恋爱关系以及愉快、自由的商业化幻想不断地传播,使人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状态永远都不可能达到。关于存在的焦虑、恐惧和憎恨滋长了这些状况,因此,产生了对自我和他人的暴力。在美国的影响尤为严重。对于半数以上的非洲裔美国人,后现代主义生活的绝大部分都是这种状况(韦斯特,1988: 277)

在尼采的分析中,不满情绪主要有两个来源:

对我们所有人不可避免都要死亡的人类状况的愤怒:我们可以称其为“存在性不满”。前现代的宗教结构在来世中给予安慰,而现代状态下,我们却找不到关于遭受苦难和死亡的任何超自我目的。并且

从使得牺牲成为必然的制度性安排看,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某些人遭受痛苦和伤害。我们称之为“市民不满”。偶然性文化通过建立情绪基金夸大了这两种不满情绪的来源,这是破坏性的。

应该怎样建立和偶然性文化相协调的社会公正形式?

再次引用韦伯的话:“人类需要一个有意义的宇宙。如果个人对他或她的身份根本都不确定,就会导致不作为和社会瘫痪。如果一个民族没有办法确保能够实现包含性的存在感,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新右派现实主义的新常识要求简单的确定性和简单的秩序。例如,赫恩斯坦和默里(1994)试图在下层黑人社会中安抚这两种形式的不满情绪。他们认为低智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过重负担的原因。这两位作者试图低调陈述偶然性,提供自然主义以使不平等合法化,并缓和存在的危机。对于默里而言,下层社会成员只需要把他们的愿望变得现实一些,换言之,他们应该否认自己的现代性。现代的组织性“社会或实证”公正的空想在于人们对现代性的期望:现代性可以最终告诉我们每个人事实上或“真正”是谁,包括男人、女人、黑人、同性恋者、犹太人、罪犯、精神病患者。我们知道了人类状况的基本真理后,就可以创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并可以使之稳定。但是科学所发现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有固定身份的地方,关于基本客体的秘密也不是一直都为人所知的,只是一套实验结果、商品和思想的技术客体。与这一不稳定世界相抗衡的是世界熟悉的、完整的、一元的、稳定的、“权威”现实的混乱状态。易变的、又是程序问题的公正问题,能够支持吗?论点是我們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公正的国家,但我们可以公正地做事?莱奥塔德(1985)毫无讥讽地把这一论点称为“公正游戏”。

后现代公正是不是一个流动性问题,是不是即使意识到没有任何特定的社会安排是公正的,也要努力寻求公正的问题?在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这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公正安排是否是可以接受的一种结果?

没有连续的现代性叙述,公正游戏也只是一个游戏而已

这种公正游戏的思想是建立在启蒙工程的基础之上,但右派和极左人士们大声地疾呼现代性已经枯竭……据说,权力授予只是放更多的钱进某人口袋的问题。没有社会梦想什么是日常生活的现实?我们又将做什么?我们只需游戏。我们诱惑,我们提议,我们接受,我们索取,我们竞争,我们游戏——社会成为一个游戏的场所,只能通过市场和那些懂得享受日常生活的人才能联结这一切——对于其他人而言,一种平静的(有时不太平静的)恐怖主义即将来临。熟练技术得以有所区别地分配和回报,对待后现代状态必须要有一套特殊的技术。

制度也在游戏:为白领犯罪辩护的首要策略非常简单——使它看上去非常复杂,没有人可以理解,并借此推卸责任。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如鲍德里拉德(1990),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这些符号的交换价值,不仅不同于它们的使用价值,甚至与使用价值相反。因此,当美国政府为了评估犯罪,要求就世界范围内的活动提出报告时,埃克森公司提供了一份12卷、每卷长达1000页的报告,仅仅阅读这些报告,控诉方就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更别提分析这些材料了。对信息的要求使得我们陷入了不可能获得有用信息的境地。埃克森游戏需要信息,因此反映自然的旧信息结构是不可能实现按比例分配的。

对于下层社会,游戏是不同的。哈里森在《城市内部》(1985)描述了一幅靠领救济金度日的人们的凄惨景象。在抵制贫困的《绝望十年》的慈善运动中,一位靠领取基本抚恤金的人写道:

“你是一个穷人的时候,必须要格外擅长于管理、自律、节约,还要格外擅长应对各种不断的危机、压力和绝望。我们中几乎没几个人擅长,富人也是如此。(引自费恩斯坦等人,1992:146)

后现代主义是社会个性形成的动力的崩溃吗?我们只是组合成分?

莱费伯里(1984)在对日常生活进行分析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认为现代性的失败在于我们在理解了自己无法对所居住的世界施加影响后经历的那种异化。我们为自己的行为、信仰寻求道德指导原则是毫无意义的。现代社会必须要超越消费游戏,以提供一致性。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一样,莱费伯里试图创造出自主思考并感觉的个人,可以实现个人的愿望,发展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联结左派和右派愿望的空想。然而,有评论家问道:“现代的个人自主工程要从属于并归入市场定义和导向的消费者选择的自由吗?”(鲍曼,1987:189),而且,后现代主义并不意味着官僚政治的终结,又有了一种新形式的组织结构。恩斯特·盖尔纳(1994)提出了“组合式个人”的概念。组合式个人这一概念和组合式家具具有其相似之处:

“这种家具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由零碎部件聚集而成的。你可以买其中一件,它可以独立起作用。但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或者有更多的收入或空间了,你可以再买另一件,它会和以前买的一件相配,整套家具还会有一种美学上和技术上的一致性。你可以随意对零部件组合或再组合。”(1994:97)

买传统家具时,你需要一下子买下全套家具。把组合家具中的一件和传统家具组合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经常会导致一种折衷主义的、无条理的混乱状态。传统个人适应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像一件有固定风格的家具。他完全不会和那些有不同文化模式的人混合在一起。在历史上人们并不是组合式的,而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片断的社会里,他们的行为要有意义,作为整体的部分有主观意义。现代性在西方创造了文明社会,充满忍耐力、多样性、机遇、风险、不可预测的事情、偶然性以及完成多项任务的预备状态。只有具有有效或灵活的、具体或器械的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秩序,文明社会才得以存在。组合式个人:

“……是非常易变的,更不用说各种活动的反复无常了。他是组合式的,因为他能够以同样普遍的文化风格,完成各种任务,如果必须,还可以以普遍的文化标准风格熟读具体工作说明。”(同上:102)

组合式个人也游戏:他参加工作面试,使面试小组相信他可以胜任这一工作。夸大他的经历时,他可能说谎——诱使面试小组相信他的能力,但这一诱惑同样也是对继续努力的承诺。他宣称,他有能力完成

令人惊异、又使人困惑的许多任务。对于盖尔纳：

“正是他的出现或再次产生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同上：102)

这一个组合式个人的概念是我们晚期现代自我所期待的各种能力的一个变异——现代性有(理想地)一种自我形式,形成了本质感。这是一种内化的自我,有发达的记忆力(对休谟来说是身份的关键),并已经学会了为未来而计划现在(韦伯的理性自我);已经学会了把世界看作一个商品领域,把自己看作值得投资的商品(教育、获得学位等的动力);已经学会了把自己的灵魂解释为知识和自由的物体;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欲望,指引它们达到适合社会结构和游戏的、相互一致的目的;已经了解了社会规则的本质即服从规范。日益增长的本质和一致性使它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和羞耻感相对应),并认为它应该对所有现在看来是从属的行为负责,对所有起源的实际用途(对康德式判决的实践理性——法庭)负责,对它本身负责(他的行为、他的犯罪),并且服从于他的控制(他的犯罪性)。

但是,这也同样是一个已经学会了按照利用市场、并获得市场上交换商品的能力来判断成功的自我。晚期现代自我是一个消费自我,它回到了前现代迫切标志的身份,但是,在前现代自我适应他或她出生的身份地位的同时,偶然性文化使晚期现代自我的身份以及身份标志的收集成为一个个人选择问题。所以,这个位于后现代主义中的自我宣称他或她有自己生活方式,宣称在他们成为附属物之前收集或使用商品的过程中,他或她是自由的。但在把个人需要转变为个人自主、自我定义和审美生活的过程中,在把个人发展为拥有并消费市场提供的产品这一需要的系统化过程中,证实了自我在完成看似目标的自我定义和个人自主的任务过程中是懦弱的。屈服于市场和自我调节系统的概念,是启蒙工程的失败,在自我中相当于对变得真正现代的抵制。(所有太)社会的自我会使自身对精神病、犯罪、吸毒、失业以及不满情绪等相当敏感。

理想的晚期现代自我适合各种晚期现代游戏。

我们的组合式个人拥有社会资本:犯罪性是社会资本的一种功能吗?

要想在游戏中取得成功,需要资本。后现代主义创造并要求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今天,资本并不仅仅指金钱,它还指一系列的个人因素——比如智商、个性特点、社交技巧等,如忍耐程度、以非暴力方式对待压力的能力、清晰表达和交流思想和经历的能力。犯罪学实证主义的目标是确定少年犯和成年犯罪人的犯罪的稳定趋势(犯罪性)和其它麻烦行为的形式中行为连贯性的根源。如果人们假定“存在某个独立的事物,由许许多多产生于童年时期并且持续到成年的反社会行为组成”(罗宾斯和拉特克利夫,1980:248),然后发现它的基础就解决了犯罪性问题。对于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关于自我控制的观点,纳金和佩特诺斯特(1991)作出了评论。他们提出了一群体多样化的假定,这一假定存在于生命早期形成并保持稳定的内在犯罪倾向中。被标记为“反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如吸毒、引起事故的鲁莽行为(尤其是驾车时),都被看成同样性格或倾向的表达。但是,正如标签论所强调的,这种持续性可能有许多原因,并且在许多过程中个人倾向或性格仅仅是诸多因素的一个。当我们把标签论警告我们的这些过程放入对社会结构、结构缺陷以及减少的生命机遇的意识中,这一点最为清晰。另外,可能是早期犯罪行为间接地通过减少非正式联系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范围影响着后来的犯罪。对于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1990),早期少年犯罪和成人犯罪的联系就在于内在倾向。同样,赫恩斯坦和默里(1994)指出,由于个人在生命历程中对他们自己进行了分类,在社会结构的各种位置上他们最终会在哪儿是内在倾向或性格(个性、智商、自我控制)的结果。其他特征,如失业经历或社会地理学中的地位等,都被看作是虚假的,并且很大程度上是由遗传或早期受家庭——学校发展影响的个人层面的差异而导致的(戈特弗雷德森和赫希,1990:154—165)

我们在重新分析传统犯罪学的众多实证作品时,由于充分考虑到了社会化和后现代性的发展的不断转变的需求,它们的深度日益增加,在《增长中的犯罪:人生的道路和转折点》一书中,桑普森和劳布(1993)使用了“社会资本”一词来创建一种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这一理论建立在对格卢克在二十世纪

四十、五十年代实施的、约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纵向研究数据的再次分析基础之上。他们总结认为,在格卢克的研究中,犯罪的起因在于“结构不利、与家庭、学校、工作的非正式社会联系的弱化以及个人与可提供社会资本的机构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分裂。”(1993: 255)

家庭和社会结构因素互相作用。尽管许多研究表明,低收入、失业、不充分就业增加了家庭分裂的危险(例如,柯里,1985;威尔逊,1987;桑普森,1987),以前犯罪学的趋向(例如,伯特,1925;格卢克,1940,1968)是将社会语境和家庭因素相互分离了。这一划分反映在植根于政治哲学和法律思想中的公共和私人的界限上。尽管我们必须接受一种更为彻底的相互作用的方法,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先前的理论中的静止趋势是固有的。例如,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适当社会角色的定义是社会学联结社会结构和个人合宪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成功的社会化就是指习得社会个性、期望和规范,使自己适合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给自己规定的这种或那种的角色。在后现代主义中,建立在工业主义语境中、相对已经确立的、看待社会、自我及社区的基础,即便不是已经完全被推翻,也已经被完全动摇了。在二十世纪四十、五十、六十年代一直存在,直到今天还在潜伏中的相关舆论下,社会化和儿童培育的惯例强调从属概念,把自我的发展看作是在相对一致完整的惯例中受地位影响和限制的过程。那些个人似乎不能把某些分析并入正常状态的结构中,而实证主义犯罪学正是属于这种分析。在后现代主义中,并不重视基于根本和功能一致上的社会秩序,而赞成一种以过程为基础、更不固定、重视行为的模式,这种分析必须要改变,我们承认社会进程牵涉到个人特征(如个性特点、智商忍耐度)和社会结构因素(如家庭分裂、贫穷、下层社会)相互影响等范围相当大的变量汇集在一起,互相作用并影响对方。

在个人性格特点中寻求犯罪的解释也不能把性格形式和自我控制从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的变化模式中分离开来,因为犯罪的多样形式是由犯罪或抑制犯罪的社会机会、相关机构或个人及刑事司法系统的区别反应,由于成熟或改变、弱化、加强与他人的归属感或联系感的社会关系网施加的限制构成的。非正式社会控制过程在社会地理学的不同地方和从未成年到成年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作用。在生命周期和个人位置上,正式或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重要制度也是不同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女性更多地是以家庭为中心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客体,而男性则是正式社会控制的主体和客体。这种非正式社会控制不需要看作来自外界,而是很大程度上在于内心的期望和态度。前面对责任这一道德标准的讨论使我们警觉地把非正式社会控制作为对爱和养育等社会关系责任的接受,这可以起到对犯罪的实用主义需要的抵制作用。在生命周期中,个人在他们与家庭、学校、同伴群体、相邻环境、与其他人联系时间、高等教育或职业培训的规定、职业、爱情以及对异性或其他种族的理解之间,联系和经历也是变化的。另外,他们在与福利和青少年司法系统官员、警察以及成人司法系统的联系中也会变化。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指犯罪来自个人与社会、亲近群体(家庭、学校)之间联系弱化的特征,因为这种联系的弱化趋势目的是为了要求正式社会控制网络增强监视、要求服从,并监禁那些犯罪人。然而,构成主义观点的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群体按照期望的原则、规范和价值观念创造并调整自身,并通过社会化使规范和准则生效的能力。实现这样一个连贯、理性构成的整体,是古典犯罪学家的梦想——这就是社会公正。后现代主义认为这一切都很复杂、模糊。新古典主义的缺点就在于回归没有社会的公正。

由于缺乏连贯和构建完善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中的生活可能是一项伟大的历险。在许多思想包围中,在这缺乏确定性的最终标志的领域中,服从于要创造自我的命令,后现代个人和后现代社会都踏上了一个未知的行程。如果个人和社会的幸福是目标,对幸福的追寻发生在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界限消褪的地方。这是一次历险,只可能发生在过去几代人中很少一部分精英身上。晚期现代性宣布它现在对所有人公开,更确切地讲,它是强加于大多数没有资源可以获利、不能够竞争、缺乏在后现代主义中创造自己并进行旅行的资源——经济、人文和社会资本的人。传统地来看,我们承认,那些没有足够经济资本的人,生活机遇也相应的少了很多。现在我们理解了后现代主义状态需要更为复杂精细的社会技巧和技术能力——我们称其为人文资本。我们可以看到它不定期需要个性、柔韧性、忍耐性和自尊,这些都来自于个人和其他人的关系。这些关系的特点和影响,我们称为社会资本。因此,社会资本是投资个人关系的结果,比如被爱、被重视、被欣赏、被期望、被支持、被教育、被依赖的经历,以及无数其他人类深层交往和依赖

的形式。如果加以适当调节,新生婴儿在完全依赖中最为清晰的品质将会成为后来所有形式社会生活的特征。

这三种形式的资本——经济、人文、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是爱的经历和人力资源,如孩提时的时间和注意。个人获得的作为(潜在)个人的注意是不同的。没有任何两个孩子是被完全同样对待的。例如,当前,许多父母花在给女孩阅读的时间比男孩的要更多。由于学校教育主要是围绕读写能力,尽管这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他们在教育女孩在学校好好表现上,还是比教育男孩花费更多的社会资本。社会经济的不利条件或经济资本的缺乏(例如,和那些必须工作很长时间、请不起照看孩子的人的父母相关),意味着对孩子投入的社会资本的减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贫穷和不利条件对犯罪产生更多的间接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孩子与父母、师生、朋友、雇主与员工之间——在生命历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社会投资或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来自强大社会关系(或强大社会联系)的社会资本首先是在孩提阶段在家庭中经历到的,然后又以各种明显不同的形式经历到,如青少年时期在学校里的同伴群体和“优秀他人”之间,在工作时同事之间、雇员之间,在运动队中队员之间。如果这些经历是积极的,就会促进自我,增强个人可以获得的心理智慧,在他们生命历程中,给他们的自我价值、自尊、自信感以强大的支持。

社会资本是构建社会统一的因素之一。迪尔凯姆关于社会在有机条件下统一的信息是一种关系和期望的变化,即如果他们经历了相互依赖,个人就会重视这样的相互作用并且理解现代性的相互联系。互相依存的社会联系来源于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任务的复杂性和生命网络。对互相依存的社会联系的经历增加了社会资本,要求个人在社会关系和制度方面增加个人投入(以及社会价值观:维持一系列的种族及社会群体的个人的深层社会关系就相当于实际上坚持容忍和多种族的原则)。社会资本可以受社会政策的影响,因为社会资本来自社会经济状况中人与人之间的经历和关系,并受到社会阶层、意识形态和性别概念的影响,比如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社会联系。它可以直接受到刑事司法政策中的禁闭和刑罚控制的影响,并削弱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多种形式的基础,因此,刑事司法能够引起犯罪。

最后结束语?超越后现代主义者的疑问?

我们身在何处?又要往何处去?这一旅程的本质是什么?只要我们不停地提出这些问题,我们就是现代人——沉迷于理解(我们)自己和语境的任务——沉迷于建构一种内在性、一个可以居住之地,并且用我们的存在来美化它的任务。

为了使世界成为现代、理性、自主的自我的居住之地,人类消灭了先前设定的自然结构的上帝的超越存在。我们要使世界充满新结构和新形式的建筑物,使世界与真正本质的现象和社会密切联系。犯罪学所从事的任务就是要建立坚固的结构、坚实的知识及稳定的社会,并给那些有权力的人提出关于社会控制、理解犯罪的建议。我们沿着犯罪学的历程,从现代性走向后现代主义。在它所研究的主题中有对自由和纪律的双重需要——来自社会学和道德理论——来自经验主义和规范性理论、普遍价值观反对狭隘的地方观点。共同愿望使普遍概念的抽象性和距离进一步人文化。

由于其知识和权力密切相联,犯罪学曾经主要是社会当权人物的话语——它还没有受到与官员犯罪相关的狭隘性的阻碍。现代性在构建过程中是无情的。它部分地建立在我们现在称之为违反人道罪之上——在奴隶制之上,在土著人口的灭绝上,在违背的协议中,在敲诈勒索之上——但是由于它在进步的叙述下发展,这些事件被称作文明进程的部分。种族灭绝的犯罪从来没有被起诉过,违反人道罪的概念是由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提出的,现在我们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是可以超越法律(超越犯罪)的。

我们话语的界限是什么?如果犯罪学要使它自己脱离官方权力,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谈论的。今天,法律和秩序的声音、上层社会的愤怒,都要求犯罪学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控制信息。社会秩序在全世界范围内面临压力。悲观的评论人士认为,一个新的帝王堡垒正在形成。欧洲、北美、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看上去要面对堡垒之外的一种新野蛮状态。在堡垒内部我们的城市开始完全分

解——下层社会正威胁着它们。我们向四下观看,似乎已经被犯罪包围了。但已经很难区分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现代性为了建立而破坏——权力接踵而来——但是没有任何固定的结构。那些我们现在看作是深思熟虑,是技术力量,是知识和权力的混合,是混合物的结构——运用纯素材、纯自我、纯自然力,我们找不到地方建构这些结构。因此,后现代世界呈现出一片超现实景象。它构成了世界的创造。在那里,价值属性更难归因,我们周围全是符号、角度,任何事物都不是纯本质,每件事物又不是最基本的。

在我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进程中,我们寻找共性,寻找社会统一。现代性已经使建立现代自我这一过程准备就绪,现在只是在提出警告,自我必须控制它自身。但是自我需要引导,需要卓越人物的影响。它必须要被迫去梦想吗?仅仅是梦想吗?在《同性恋科学》一书中尼采对我们的命运提出了警告:我们应该知道自己在梦想,但我们还是继续梦想。目前,我们也愚弄我们自己,解构和非神秘化夺走了国王的衣服,世界会自我纠正的。另一个梦想……

生命的辩证法涉及到的是精神、肉体以及我们的梦想。一方面,耶稣基督弥留之际,先前的叙述讲述了隐含在人性下的暴力和脆弱——因此,基督徒们了解耶稣的肉体和血液的化体。神圣意图的基础……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肉体 and 血液组成的人类。人性是它自己的秘密和基础。我们无法梦想我们以外的事物……我们已经够神秘的了。或许布莱恩·佩顿在他的《一滴清晰的血》这首诗中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

“这些城市脆弱地漂过
地球的外壳;
它们需要一滴神奇的血,
一滴清晰的血。”

佩顿梦想到了纯洁,想到了一种本质,因为:

“孩子们在短暂的世界中漂流,
他们的梦想中,有一滴血,
拒绝着太阳的烘烤,
一滴比任何血都纯洁的血。”

这种对纯粹的寻求并不是对希望、进步或反应的拒绝,因为这一滴血反映了特殊和普遍的辩证统一。

“我的心中有
只爱某些事物的习惯,
我要断绝所有与这些习惯相关的联系,
因此我需要一滴神奇的血
一滴清晰的血。”

鲜血以不同的形式到来——人类鲜血的喷洒早于现代性所构建的犯罪概念——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中它又有了崭新意义。如果洛杉矶暴乱是后现代第一次城市暴乱,那么前南斯拉夫冲突就是后现代第一次战争。受多种观点和冲突的利益领域的曲解,这一悲剧是民主多元化希望的破灭,是不再建构一个相互影响和个性的社会,是不再构建现代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穆斯林或者波斯尼亚—克罗地亚身份。面对为后现代主义规范性方向而奋斗的前景,国际社会在苦难和愤世嫉俗中迷失了自己。犯罪和罪犯等词开始使用并且被滥用。一位塞尔维亚士兵曾经告诉我,他在对一个波斯尼亚—穆斯林姑娘的轮奸中是排第十位。当第八个人在对这个姑娘的身体进行蹂躏时,这个士兵再也无法忍受,便一枪打在这个姑娘的头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当局认为他完全是一个替罪羊,被指控强奸和谋杀,并向战争犯罪法庭提起诉讼——但是其他人说出了“事实”,诉讼没有成功。又一件未经报道的犯罪,又一件将被忘记的诉讼,又一件犯罪学很难处理的事件。他是罪犯,或者他只是个较迟发现自己人性的人?真正的罪犯是那些站在一边允许冲突继续的当权人物吗?那么,那些认为很难弄清事实的人又是什么角色呢?

我们议论、分析、争论,我们在疑惑中迷失了自己,但我们同样遭受或忍受痛苦、谋杀、恋爱、绝望。我

们需要的是一种话语,使它能够在大人物和小人物、当权派和被害人的形式和结构之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犯罪学,能够把自我怀疑看作是继续(再)构建的基础,而不是绝望的理由。怀疑对于创造来说是必须的,对人类状态的自我怀疑和矛盾是一个基础。我们对一切都持有疑问,这不能成为不作为的理由,而是现代人为寻求更好的人性而采取行动的证据,是意识到偶然性及他们的社会脆弱性的证据;也就是说,意识到了他们的现代性,以及现代性构建的脆弱性和不完整性。

www.cnki.net